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相互作用：一个理论透视

蒂姆·昂温

尽管对人口从乡村到城市迁移的地理研究已有很长历史，但迄今出版的关于城市和乡村相互作用的材料却很少。相反的是，许多关于‘发展’文章把城市和乡村分离开来研究。这已对世界上的贫困地区与社会和经济变化过程的理解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八十年代以来，人们日益重视城乡相互联系的重要性。

正如哈维曾指出的：“在理解向资本主义转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形式时，分别考虑城市和乡村可能是有用的——例如，从中发现城市工业部门对立干乡村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只是在形式上被包容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体系中。但是，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其中，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在资本的控制下）工业与农业劳动的分离表现形式就失去了许多特殊意义。”因此，需要把城市和乡村的变化作为总社会构成的一部分看待，能达到此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分析变化的两个中心的相互作用。

第一个试图去定义城乡相互作用的是普林斯顿（1975），他划分出相互作用的五个主要类别：人的运动、商品的运动、资本的运动，社会交易、行政和服务的供应。英国的古尔德（1982）记录了城乡相互作用“怎样在1982年举行的由社会科学研究会人类地理学委员会发起的四个讨论会上成为首要论题的”。该讨论会着重对城乡相互作用的三个基本方面感兴趣：人的移动、资源转移、社会的相互作用。这些方面的兴趣又由英国地理家学会发展地区研究小组84/85年建立的“城乡相互作用网”进一步发展。“城乡相互作用网”的建立是对第三世界城乡相互作用研究发出的倡议。在古尔德的文章中，他认为城乡相互作用是“人、商品、技术、货币、情报和思想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这些流动不仅是发展过程的特征，而且是乡村和城市变化本身的特征。”

基于人们对乡村和城镇间联系和流动的关心，人们对过去30多年间，世界各国政府在计划政策中采用的某些以城市为基础的模型和理论进行了理论再评价。本文将阐述李普顿、罗德耐里及施特尔和泰勒最近各自的观点。在此之前，有必要区分他们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

增长极、从上向下发展和寄生城市 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发展计划中关于城乡联系的许多文章由三个基本的、相互联系的概念控制着：增长极概念（growth pole），从上向下（top-down）和从下向上（bottom-up）发展之间的区别以及城市作为寄生的（parasitic）或自生的（generative）的定义。其中每一项都要详尽阐述。罗德耐里在如下措辞中已简洁地抓住第一项的主要方面：“空间发展的增长极概念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在中心大城市集中投资资本密集型工业，能刺激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将扩散开来带动区域发展”。从中可见，增长极概念明显地涉及哪里产生“发展”，而且清楚地表明重点是城市发展，希望城市发展在区域和地方规模上带动农村发展。他还认为：“增长极概念是基于原理：市场力的自由作用将产生‘波动’（ripple）或‘扩散’（trickle down）效应，刺激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在增长极上的工业投资将是农业和商业活动的发动机。”

施特尔和泰勒在把增长极概念与从上向下的计划联系起来时有同样的论证。他们认为：“从

上发展根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其空间显示是增长中心概念……假设发展是由外部需求和创新推动驱动的,并且几个动力部门或地理群的发展将以自发的或诱导的方式扩散到体系的其它部分”。这种发展政策的本质含意是,投资主要放在城市和工业,且是利用‘高技术’的大工程为基础。问题是,理论上本应从增长极外延开来带动农村发展的发展,事实上却导致每元资本收入在国内不同部分的集中。

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验看,那些采取发展极政策的地区,已表明有益的‘扩散’效应大体上不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与之相反的‘回流’(back wash)效应。‘回流’效应造成中心和外围地区,城市和乡村更大的不平衡。霍斯里兹的自生和寄生城市间的区别与‘扩散’和‘回流’效应相呼应:‘自生’城市是那些对城市外围的农村产生有益影响的城市,而‘寄生’城市则与之相反。此理论框架中需要说明的是那些决定一些城市自生和另一些城市寄生的条件和联系的特征。

针对基于增长极概念的从上向下计划的失败,产生了与之相反的从下向上的政策。这种政策把重点放在基础需求的供应和农村地区的明显发展上。钱伯在《农村发展:从最后到首位》、理查兹在《土著农业革命:西非生态学和食物生产》书中,都很好地表述了这种计划重点转移。注意力都集中在农村贫穷、土著的地方行为及信仰体系为起点的发展需求。

城乡相互作用理论 1.李普顿和城市偏向 最近几年,对以城市为基础的从上向下发展政策的最直率谴责之一是李普顿提倡的城市偏向(urban bias)。此概念试图说明,当今世界上贫穷国家内最主要的阶级冲突,不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也不是在外国与本国利益之间,而是在乡村阶级与城市阶级之间。李普顿在发展自己的理论时,否决了如下观点:(1)农村和城市之间没有区别;(2)城乡二元的划分太简单;(3)真正的差异存在于主要的城市与其它部分之间;(4)工农业部门的区分在解释贫穷时具有重要意义。据此,他寻求在资源分配中有明显城市偏向的证据。李普顿论断的本质是,城市人的力量使他们能进行不均衡的资源分配,这种分配偏向他们自身利益,偏离农村人的利益。他不仅认为城市偏向造成穷人的贫穷,还指出:“农村地区不平等也大部分归因于发展政策的城市偏向。”他认为这是由于城市精英与那些能为城市提供食物、储蓄和人力、剩余资本的较富有农场主同盟的存在。按他的话:“即使不是有效和公平地交易,城市精英也能得到农村廉价的剩余、食物、出口品等;即使数量不足,农村的富人也得到农村投资、价格补贴、援助等的绝大部分。而有能力且常常是诚实的农村穷人,得到的主要是一些伪善的空话。”

坎布里奇认为李普顿的城市偏向特征是:“城市部门对食物所支付的便宜的收购价格和其一系列不利于农村阶级利益的扭曲价格;许多不平衡投资战略偏向于城市和工业网络,而缺少投资的乡村则技术枯竭;基本的健康保健和教育设施缺乏限制着农村地区”。据此,我们有了一系列联系城市和乡村的可测因素,具体地衡量李普顿观点的有效性。但是,坎布里奇在更高理论层次上对李普顿城市偏向进行评论。首先,他指出,不能仅仅因为城市人以公平的价格获取农村的剩余,就说城市和乡村社会没有差异。这里,李氏似乎对城市贫穷与乡村富裕的存在没有足够重视。第二,他发展了李普顿阶级概念的标准,指出乡村精英的矛盾位置。乡村精英既要考虑食物的价格、提供交通和教育设施,作为农村阶级的自然领导者,又要考虑提供农业投入,成为城市阶级的一部分。第三,坎布里奇对李普顿的政治简化论概念进行了评论。李普顿认为城市和乡村阶级各自具有明显限定的政治利益,而事实上,极少具有这样界限分明的城市相对于农村的政治忠诚。

既然李普顿论断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存在特定的城市阶级和乡村阶级被怀疑,那么,断

言这些阶级存在的整个‘城市偏向’大厦值得怀疑。尽管从描写和经验水平上，李普顿提供了对乡村和城镇间剩余相对流动的有用说明。但他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造成流动的原因。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他将人与地融合在一起。作为乡村或城市的地方是相对地易于确定，而考虑人则要困难，但是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地方造成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正如奥康纳对非洲情况所指出的：“必须讨论的是城市人对农村人是否剥削；在非洲的困难是两个群体的区分。”

我们再次回到文章开始时列出的问题：是城市一些特殊东西决定资源流向城市，还是把城乡关系看作受制于社会内部的其它一些潜在结构力量？

2. 罗德耐里：中等城市(secondary city)与城市化分散 罗德耐里与李普顿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适当忽略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考虑。例如，李普顿认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城市人决定了不平等发展的类型；罗德耐里则认为，本质上，城市规模等级(city size hierarchy)是决定发展政策成功与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不同于以农村为基础和“从下向上”发展计划，罗德耐里指出：农村发展的目标，无论如何认真构思，都无法独立于城市或者完全通过“从下向上”发展战略而实现。他指出：“联系是决定性的。因为农业剩余的大部分市场在城市；大多数农业投资来自城市机构组织；随农业生产率提高解放出来的农业劳力寻找工作及农业地区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社会、健康、教育和其它服务的大部分来自城市”。因此，他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希望在社会和空间方面取得广泛的发展，必须形成地理上分散的投资模式。这种投资模式可以通过创造“一个分散、连接和完整的城市体系”形成。这种城市体系为住在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任何地方的人们提供通向市场的可能通道。

此观点的中心是认为扩散极或小城市寄生观是不合适的，并且认为“采取战略地点安排上的分散投资，通过“从下向上”和自动过程来发展，只能为农村人创造最小的发展条件。”

正由于罗德耐里的理论重视联系，特别是农村和小城市间的联系，较小城市与较大城市间的联系，使他在城乡相互作用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罗德耐里认为被他称为中等城市的发展能提供五项主要有益的结果。第一，中等城市减轻了大城市在住房、运输、污染、就业和服务供应问题上的压力。第二，中等城市减小了区域不平等。如果承认城市生活水准比农村生活水准高，那么，中等城市的发展能扩散城市化利益。第三，中等城市不仅能吸收剩余劳力使农业生产更加有效，而且为农产品提供服务、装备、市场来刺激农村经济发展。第四，中等城市提供更大的、分散的区域管理能力。第五，中等城市帮助减轻中间城市的贫穷。罗德耐里认为，中间城市最尖锐、最明显的问题是贫穷与瘠薄。

针对城市的自生性与寄生性的讨论，罗德耐里指出，中等城市对它们所在地区产生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下列十因素的可行性：(1)地方领导者把城市和地区的成功作为自己的成功；(2)地方领导者向他们所在城市投资；(3)地方领导者勇于创新；(4)地方领导者积极进取；(5)国家政府支持城市的内部增长；(6)通过共同受益的交换过程，城市中心建立的经济行为与边缘地区相连；(7)城市内部的经济活动相互联系，产生乘数效应；(8)组织经济活动为地方居民创造收入和促进内部需求；(9)公共和私人部门联合起来，促进经济活动的利益均享和分配；(10)城市领导者促进和鼓励社会与经济行为变化的意愿符合新情况与新需求，为城市居民所接受。

从以上简短总结可见，罗德耐里的发展计划观有两点是明显的：本质上，通过操纵城市等级实施变化，而且绝对地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变化结构为基础。

与李普顿的观点不同，罗德耐里认为，农村的变化最好由中等规模城市供应的社会、经济设施来实施和鼓励。这与万曼里的观点很类似。万曼里曾指出，在印度，正是较小的城镇缺少服务设施是限制农村变化的最重要因素。罗德耐里的论述有这样一些前提：如城镇市场设备的发展必然促进有益的变化，而且这种灌输的变化能同时有利于城市和农村；存在着一个“平衡”城市化模式。在他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的中心地体系”时，暗示着这种“有效”的体系能被创造。实际上，这个体系十分适合于古典的等级规模标准分布。他还指出，特大城市控制着发展中世界，为了取得平衡发展，有必要实施能加强中等城市发展的政策。按他的观点，第三世界的国际援助组织和国家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发现有效和适当的方式，通过直接投资或具有空间影响的国家政策，来帮助地方政府与私人投资者加强中等城市经济和服务的传递能力。与其有关的问题是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古典等级规模分布能促进“成功发展”，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模式将必然地有益于穷人与低特权的人。

至于罗德耐里对“自由市场”本质的论述，从他用来区别中等城市是否对其周围地区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因素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因素有赖于城市人及国家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利他主义程度。依罗德耐里的观点，具有进取心与创新精神的地方领导者将自己与所居住的城市相联系并向所居住的城市投资，能保证区域平衡发展的成功。上文中，被他称作产生有益地区的十因素没有一个是直接考虑农村经济的，而且，在自由市场体系下，说服那些具有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人们为了城市和乡村穷人的利益放弃当前的利益是困难的。尽管，罗德耐里特别声称：“一个功能有效的中间城市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都能实现广泛的经济增长和利益的公平分配”。这意味着，在资源的公平分配上，是城市聚落结构，而不是潜在的生产方式在起决定性影响。但是，他没能评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区别，而且，在整个分析中，还绝对地设想中等城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他的许多观点是在投身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办事处资助的在菲律宾、玻利维亚和上沃尔特的一系列工程中形成的。这些被称为农村发展中城市功能的工程与普遍的资本主义结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的理论发展。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罗德耐里为空间发展中主要联系的分析聚合了广泛、有用的基础。这被归纳在表中。

表 空间发展主要联系分类

| 联系形式 | 要素 |
|------------|---|
| 物质联系 | 公路网，河运和水运网，铁路网，生态相互依赖 |
| 经济联系 | 市场模式，原材料和中间品流动，资本流动，生产联系——后向、前向和侧向，消费和购物模式，收入流动，地区之间商品流动，“交叉联系” |
| 人口移动联系 | 人口迁移——暂时的和永久的、工作旅行 |
| 技术联系 | 技术的相互依赖，灌溉体系，通讯体系。 |
| 社会相互作用联系 | 访问形式，亲戚形式，习俗、仪式、宗教活动，社会群体相互作用 |
| 服务传递联系 | 能量流动和网络，信用和金融网络，教育、培训和函授联系，健康服务传送体系，职业、商业和技术服务形式，交通服务体系。 |
| 政治、行政和组织联系 | 机构联系，政府预算流动，组织相互依赖 权力—批准—监察模式，内部裁决办理模式，非正式政治决策链 |

3. 施特爾和泰勒：从下向上发展 罗德耐里主要考虑通过城市等级操纵来实现利益变化，

施特尔与泰勒则恰恰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如果要公平地发展,从上向下发展要与从下向上发展结合起来。“从下”发展认为发展主要依靠每个地区人、自然和公共机构资源的最大移动,最基本的目的是满足该地区居民的基本需求。这种发展观直接针对贫穷问题并从底层激发和进行初始控制。这与罗德耐里的倡导相对立,通常以农村为中心,小规模和应用“适用技术”为基础。施特尔与泰勒还指出了从下向上发展的其它三特征:发展是由内部决定的,所以每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独特的;发展是平等主义的和依靠自我的;发展是地方自治的。正如他们所说,“这种发展包括选择性增长、分配、自我依赖、职业创造,超过一切的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从中可见这与罗德耐里和李普顿应用的发展的定义是不同的。

向社会目的而不是经济目的的平衡转向,也反映在弗里德曼恩和道格拉斯倡导的农村城市化(agro politan)上,其中最重要的目的不再是经济增长,而是满足具体人类需要的社会发展。他们认为,“必须让发展适应生态限制;必须优先注意农村发展(在农业经济中);农村发展计划必须分散、均享、深深地扎根于地方背景的特殊性”。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倡议国家发展战略应当转向如下六个政策因素:(1)基本标准是由限定的、具体的人类需要代替笼统的需求;(2)把农业作为推进部门;(3)优先保证生产国内食品的资源;(4)减少社会阶级之间和城乡间收入和生活条件上的不平等;(5)优先保证国内工资商品的生产;(6)采取计划产业二元化,保护国内市场小规模生产以免遭大规模资本集中企业竞争。以上因素如果在计划中没有考虑,每一项都会对城乡相互作用产生影响。

针对城乡间联系争论的复杂性,施特尔指出,如果从下发展要成功,就要改变现有的平衡。首先从政治的角度,他指出,要给农村更大的自我决策力,以便本质上减少政治力量直接从城市向农村的流动;第二,改变国家价格政策,使贸易更有利于农业及其他农村的产品;第三,要促进农村生产,使其超过地区需要,形成出口流动;最后,在城乡之间、乡村之间,要重新组织整个运输、通讯网。这种发展观,是试图通过改变整体资源利用中资源从乡村到城市的不等流动。

资源分配 以上观点都涉及城乡关系影响发展的本质方式,而且特别涉及这些关系如何决定相对稀缺资源在社会上的分配。

第一,当无法清楚地区分城市人与乡村人时,城乡间存在的许多不同形式的联系是衡量城乡相互作用的基础。利用案例研究能产生流动差额,这种差额可用来显示资源净转移与估计剥削程度。但是要把这些理论应用到研究中是困难的。因为是人而不是地方进行剥削或被剥削。按迪克逊的话:“不是城市和乡村地区,也不是乡村和城市阶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也不能简单地说‘富裕的城镇’和‘贫穷的乡村’——都有穷人和富人。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看不同的人与阶级在不同的城乡相互作用形式中,如何受益的。两类地区间流动如何与更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相连。

第二,影响资源在城乡间流动方向的因素是千差万别的。虽然通常把这些因素看作是经济的、不同贸易项目和定价政策的结果,但也强调政治、社会与意识形态因素起重要作用。这在罗德耐里确定为决定城市是剥削还是发展的一系列因素中很明显地表明。其中包括了诸如地方领导者的进取心和人们接受社会变化的意愿。另外,诸如人们的观念、特殊的发展兴趣与不同的阶级兴趣都将影响资源流向。

周希增摘译自《Geography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第一章,London, routledge 1989年,邹英林校